

外國學者對現代中國的歷史解釋： 以《劍橋中華民國史》第一部為中心的觀察

林 瑾 瑤

一、前言

自二十世紀初以來，劍橋史叢書已經在西方世界中，樹立多卷本歷史著作的典範，其特色是在各卷主編的領導下，由各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分別撰寫各章節，不但從書中可區分不同研究領域的成果，更在主編的總導下，促成書中完整體系的呈現。所以，劍橋史叢書系列，在今日的出版界中，享有其一定程度的學術價值，另外也普及發行全球，和各國相關譯本的刊行。

有關《劍橋中國史》的編撰乃在1966年開始規劃，1983年「中華民國史」部分發行第一版。編者的目的是為了向西方的歷史讀者，提供一部關於中國歷史詳實的介紹。西方研究中國史的學者，利用現代歷史研究的新觀點、新技術，以及配合社會科學方面豐碩的研究成果，取得其學術價值的公認肯定，相較以往西方對於中國的研究只限於翻譯古籍，編寫固定的制度史綱及王朝更替史，《劍橋中國史》可說是具有嶄新的意義，同時它也象徵西方在中國歷史的研究上，革新性的變革力量不斷加強，推動了西方對中國研究開創新的學術領域。

本文嘗試以《劍橋中華民國史》第一部 (Republic China, 1912-1949, Part 1) 為中心，觀察外國學者對於現代中國的歷史解釋。此書原為《劍橋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第十二卷，由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主編，集結國外各領域的學者專家合作著成。全書作者、章節如下：

第一章 導論：中國歷史上的沿海與內陸 (Introduction: Maritime and

- continental in China's history) 由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撰。說明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外來因素的模式與作用，並以通商口岸為例，分析其在此一過程所扮演的角色。
- 第二章 經濟趨勢，1912-1949 (Economic trend, 1912-1949) 由密西根大學歷史學教授費維愷 (Albert Feuerwerker) 撰。說明此一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的特質，及其導致此種特質的重要因素，並分析外來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 第三章 外國勢力在華存在 (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 由費維愷 (Albert Feuerwerker) 撰。本章針對外國人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的影響進行敘述，說明外國勢力之網的形成，以及正負的多元刺激。
- 第四章 革命後的政治生活：袁世凱時代，1912-1916 (Politics in the aftermath of revolution, 1912-1916) 由密西根大學歷史學教授楊格 (Ernest P. Young) 撰。本章說明辛亥革命後自由主義政府及獨裁政體的推行與失敗，及其所暴露出中國在此一時期政治發展的問題。
- 第五章 立憲共和國：北京政府，1916-1928 (A constitutional republic: the Peking government, 1916-1928) 由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 (Andrew J. Nathan) 撰。本章介紹 1916-1928 北京政府的運作情形，檢討組織成員們的派系鬥爭，實是導致憲政體制無法落實的重要關鍵。
- 第六章 軍閥時代：北京政府的政治與軍人專制，1916-1928 (The warlord era: politics and militarism under the Peking government, 1916-1928) 由西北大學歷史學教授薛立敦 (James E. Sheridan) 撰。本章分析軍閥的部隊組織、派系、戰爭、與列強關係及地盤控制，說明軍閥統治對中國此一時期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的影響。
- 第七章 思想的轉變：從改良運動到五四運動，1895-1920 (Intellectual change: from the Reform movement to the May Fourth move-

ment, 1895-1920) 由加州大學歷史學教授傅樂詩 (Charlotte Furth) 撰。本章介紹 1895-1920 年中國思想的轉變，從改良派的進化主義，到新傳統主義，以及五四時期興起的社會主義，探討思想變化的內涵。

第八章 五四及五四之後的思想史主題 (Themes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May Forth and after) 由哈佛大學歷史學與政治學教授史華慈 (Benjamin I. Schwartz) 撰。本章介紹五四與五四之後的思想史主題，包括了進步主義、民族主義、新文化運動、新傳統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思想論爭。

第九章 文學潮流：追求現代性，1895-1927 (Literary trends: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1895-1927) 由芝加哥大學中國文學教授李歐梵 (Leo Ou-Fan Lee) 撰。本章介紹 1895-1927 年的文學潮流，共可分為：1895-1911 年的清末文學、1911-1917 年的鴛鴦蝴蝶派小說、及 1917-1927 年的五四時代之文學，揭示在文學方面追求現代性的特色。

第十章 1927 年以前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to 1927) 由約克大學歷史學教授陳志讓 (Jerome Chen) 撰。本章說明馬克思主義的傳佈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經過，以及在第一次統一戰線中，國共間的緊張關係，反映共產黨早期發展的情形。

第十一章 國民革命：從廣州到南京，1923-1928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from Canton to Nanking, 1923-1928) 由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韋慕庭 (Martin Wilber) 撰。本章介紹 1923-1928 年國民革命的過程，包括蘇聯早期資助國民黨、軍事力量的創建、革命軍陣營內的分歧衝突及權力重整、武漢政權問題、共產黨引發的暴動，乃至北伐成功的經過。

第十二章 中國的資產階級，1911-1937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 由巴黎第三大學民族學院東方語言與文化教授白吉爾 (Marie-Claire Bergere) 撰。本章特別重視資產階級與政治間的互動關

係，敘述資產階級的興起、在辛亥革命的次要角色、1917-1923年資本主義的興盛、1923-1927年資產階級在政治上之隱退，以及1927-1937年資產階級的衰落。

二、各章內容介紹

第一章 導論：中國歷史上的沿海與內陸

1912年到1949年間，外國對中國的影響是相當深刻的。如：仿效外國模式的議會、海外借款風波、海外學者領導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共產黨的成立、國民黨的改組，以及反帝的國民革命。對此費正清特別指出六點，以界定外來因素的不同模式作用：一、中華是獨特文化整體的思想仍普及；二、區分外來影響與外國勢力的實際存在；三、中國歷史仍以中國人的著述為主；四、外來影響經中國語言與書寫系統進行傳播；五、外來影響是透過感染中國個體之行爲而見效於中國；六、以新的或舊的非中國因素來塑造現代的生活方式¹。

中國分爲兩區，一是居主導地位的農業官僚秩序；另一是邊緣地及居於次要傳統的沿海區。中國沿海區雖然發展早熟，但終究是一個次要的附屬物。西方勢力的介入卻扭轉了情勢，透過通商口岸的混合社會，自外引進交通、工業技術、民族主義精神、新的領導方式、並逐漸擺脫傳統官僚的控制。因此通商口岸可說是西方擴張力與中國沿海生長力的結合點²。

第二章 經濟趨勢，1912-1949

此時期總產量緩慢增長，由龐大的農產部門及很小的非農業部門構成。約四分之三的人口在農業部門，非農業部門則集中在通商口岸城市。中國的農戶和村莊爲自然社會單位。農村集市的經濟系統，以及爲供應通商口工廠的外銷，逐漸促進現代城市的發展。不過，因爲運輸方式、技術、組織等方面的受限，所以農村和通商口岸的經濟聯繫是鬆散的。通過對中國人口統計資料的調查和處理，可見收益遞減的經濟現象，而人口職業分佈大致與清末一樣，農業比重仍大³。在國民收入方面，根據劉大中、葉孔嘉，以及巫寶三的估計，可

看出農業為國內淨收入之主項，收入構成中屬於現代非農業部門者只占 12.6%，而支出方面，處於典型前工業社會⁴。

在工業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民族工業有很大發展。外資企業與中外合資在戰後增長較快。日人控制滿洲時亦快速發展工業，但二次大戰投降後，撤走技術及管理人員，生產一時停頓。費維愷認為中國手工業，在絕對數量上有增長，而手工業發展是取決於：(1)進口和工廠產品結構；(2)總需求的規模和構成。此一時期中國工業發展的特性：(1)製造業多為外資且分佈在通商口岸；(2)除滿州外，工廠以消費資料部門突出；(3)工廠平均規模小；(4)工廠仍是傳統的社會關係；(5)現代工業集中沿海城市，占國民總產值比例很小。不過，此時期的現代工業為日後提供了基礎。

在農業方面，其總產量呈現緩慢地增長，並在 30 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前可以出口農產品。然而農業雖然扮演中國經濟的基礎重心，卻有不少困難與問題。因為私人及政府不能掌握並且分配資金、資源、技術，所以中國經濟仍呈現落後狀態。農民的窮困，除了因為土地占有、農村高利貸等因素，主要也是因為其生產所得的「農業剩餘」，遭地租與土地稅所分割，且因財產繼承之故，不斷劃出小塊耕地，也造成一種浪費。總而言之，土地租佃、耕作格局，必須配合信用借貸以及市場運行。雖然剝削性的收購體系，使商人得以擺佈農民，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商人的地位。商人的專業化、分工，讓農產品在傳統經濟體制上，發揮了很好的功能。

在運輸方面，中國仍未有突出表現，舊式運輸如：帆船、人力車、獸力車仍為重心。中國境內的鐵路，里程短、分布不均衡、營運效率低；且鐵路建設向外國舉債、鐵路借款又用鐵路營運償還，加上內亂不斷，降低鐵路營運成效；軍閥強行占用鐵路為軍用，亦使鐵路發展受到局限。中日戰爭期間，中國內地的公路建設，倒是獲得了發展的空間。

1912 到 1949 年間政府與經濟的關係，反映出國家政權未能通過中央財政來管理國民總收入，而導致中國經濟未能達到現在經濟增長。不論是北洋軍閥或南京政權，都靠城市經濟部門籌措資金，未注重農業部門以及地方的經濟；在稅收上，此時期只能利用關稅、鹽稅這類型的間接稅，未真正普及直接稅；加上有對外賠款以及償還貸款的困擾，經濟發展仍然受限。政府在面對財

政虧空上，利用舉借內債以及發行貨幣的方法來解決，仍需靠外國舉債。雖然在 1928 年至 1937 年間，中央政府對財政的嚴格控制，帶來了財源的增加，但仍是一些表象，還是維持在間接稅上，且未能解決基本的農業問題，也沒促進工業的發展。至於中國的銀行體系，亦未能為整個經濟負起信用的職能，只是被扭曲為政府籌措資金的工具，對私營工業企業家不能提供更多協助，對農民的貸款也不足。政府以發行貨幣彌補財政赤字，結果又造成通貨膨脹，中日戰爭使這種情況更加失控。

雖然對外貿易和外國投資在中國經濟中所占比重甚小，卻有重要的意義。外資的流入以及華僑向國內匯款，可以緩和資本的淨流出，保持進口大於出口的局面。外國直接投資集中於通商口岸，對於中國經濟發展亦有刺激作用。在西方為其經濟利益的考量下，在中國邊緣建立起規模不大的現代部門。不過外國人依靠低關稅、治外法權及其國內高度工業經濟為後盾，利用中國賠款及償還貸款資金，也局部影響中國經濟的停滯。

第三章 外國勢力在華存在

外國人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乃至人們的思想產生影響。外國人在中國的通商口岸、租界、租借地，擴張勢力之網，並且介入海關、郵局、鹽政等政府部門。他們可以在條約口岸享有治外法權以及關稅特權，在租界中，擁有地方行政權、自治權。以上海為例，外國領事們通過一系列土地章程、建立工務部、獲得警察權、徵稅權等行政權。費維愷指稱外國人在上海生活中，有奢華、休閒的一面，但仍有外國社會階級的問題。外國租借領土在民國依舊存在，日本在滿洲強化勢力範圍，使關東租借地成了中國大陸上的日本社會和文化島嶼。外國能在中國享有司法特權，主要是有軍隊和警察為後盾。所以，軍事力量成了保障外國人的條約權利和財產、人身安全的手段；此外並可透過外交官，以正規的外交手段，謀取其利益。

在宗教方面，外國傳教士組織的基督教傳教團，在中國迅速發展，並且參與了教育、醫療和慈善工作，如婦女運動、反纏足、反鴉片、關注勞工問題等活動⁵。因此，中國社會的改造，與傳教團實有不可分的關係，特別是教育、醫療方面的發展。

第四章 革命後的政治生活：袁世凱時代，1912-1916

關於這段時期，有兩種不同論點，一是強調軍閥主義的迅速崛起，反映革命後的危機；另一是肯定此時期是更新政治、社會之民族主義運動的第一個高潮。楊格主要採用後者的觀點。但他也表示第一種觀點可協助解釋。無論傾向那種觀點，辛亥革命本身便具有矛盾性，徘徊在成功與失敗之間。其雖推翻滿清並建立共和體制，但矛盾性也逐一浮現出來：首先，革命的成功係由協商和解而來，反映出其不牢靠的基礎。袁世凱介於這種情形，成爲日後隱患⁶。另外，革命結果未帶來國家的實質統一，中央與地方仍有隔閡，蒙古、西藏也趁機獨立。列強勢力的介入，更呈現出民族主義的矛盾以及領導人欠缺挑戰外國干預的決心。辛亥革命除政治激進主義外，實兼有社會保守主義，傳統士紳等社會上層階級仍控制政權，在既要國家統一，又要地方自主的矛盾下，鬆散的政局實不足以面對外國的壓力。

革命後，各種政治團體興起，國家統一仍爲各方追求的理想。同盟會採取妥協態度，以適應激進與保守的主張，所以有國民黨的出現；章炳麟領導統一黨，主張重組行政機構，保障國土完整；以梁啓超爲首的民主黨鼓吹建立統一國家機構，取消省一級行政管理單位。其後的共和黨由各小黨聯結而成，但未能長久凝合在一起。此時國民黨利用其革命威信，較爲完善的組織以及吸引人的政治綱領，獲得政治實力。由於強烈感受到國民黨之威脅，袁世凱密謀暗殺宋教仁，以使獨攬大權，卻因此起了軍事衝突：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中袁世凱取得勝利，此乃他的部隊具有持久的聚合性和機動性，並且適度讓步獲取地方支持，以及得到國外貸款的後盾，有以致之，進一步成爲新的獨裁者。此後，袁世凱壓抑地方勢力，建立起中央集權化的官僚體制，但因手段嚴酷，激起社會混亂如白狼匪幫的崛起⁷。

帝制運動前，袁世凱即已著手推動恢復傳統的政治禮儀，如祭孔、祭天等。開始籌備帝制後，國內反對的浪潮、外交的危機以及心腹部下的背離，但袁世凱終告失敗。然而其失敗未帶來自由主義的重新伸張，而是一種非集權化的軍事專制主義的出現。

第五章 立憲共和國：北京政府，1916-1928

在軍閥混亂時期，北京政府仍是國家統一及主權的象徵，憲法信仰與民族主義亦支撐此一觀念。特別是，憲法它為統治者提供了法理依據，一般人肯定憲法可以強國，對精英份子則具有便捷實用價值。國家政治精英有前清官僚及新興職員（如教師、律師、工程師、記者、銀行家），但前清官僚在民國早期的政治實屬重要地位，新興職員只是次要的。憲政服務了前清官僚和政客利益，另一方面也開啓了民智，使西方政治觀念滲入中國思想界的土壤。憲法的作用可使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相結合，所以黎安友認為憲法能獲得群眾支持是中國繁榮強大的關鍵所在。

1916年至1928年間，北京政府大致是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運作的，但因權力問題，導致總統、國務總理及國會的衝突。在軍閥混亂時，軍閥為得到正式官職並使地方的統治合法化，所以支持國會、內閣實行憲政制度。另外，因為外國承認北京政府，公使館的存在保護了城市；此時北京政府向國外貸款，大多用於軍閥部隊及政治。整體說來，雖仍無法進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但如教育、司法、內務、交通、外交等部門則有其作用所在。當時北京政府的特徵之一，就是現代通商口岸的中國銀行開始介入政治，現代銀行成為政府債券主要持有者，尤其是北京、天津銀行影響北京政府甚深⁸。

北京政府的組織機構看似合乎憲法：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決策有法定程序，但實質上卻是派系的。每個派系以個別頭目為核心，加上其個人培植的親信組成。派系中血親和姻親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維繫。此外，也有依據語言文化、教育歷程、師徒或結拜等關係，建立廣泛的關係網。安徽合肥人段祺瑞，因利用個人資歷、威望、政治手腕，及一批追隨者，影響政府各部門，並通過王揖唐、徐樹錚組織的安福俱樂部，將權力擴及1918年-1920年的國會⁹。梁士詒的交通系，影響政治、金融深遠。大體而言，民初的派系活動具多樣性，有軍人、國會政客及御用文人構成的派系。派系構成的政治體制可以在憲政框架中運行，卻無法避免現實中派系間的衝突。各派系不能產生壓倒性的組織力量扼制對手操縱政府，即使一派取得總統或國務總理的職位，其對手仍在政府各部、國會、銀行保留勢力，並繼續控制地方軍隊，實際上仍是摧毀

憲政機體的派系政治。由於其成員醉心於派系鬥爭，憲政體制也因此耗盡活力。

第六章 軍閥時代：北京政府的政治與軍人專制，1916-1928

軍閥控制私人軍隊，並控制一定的地盤。由於軍閥部隊有一種建制上的獨立性，為避免被其他指揮官接管，所以軍閥便透過傳統私人紐帶關係（如師生與同鄉關係），來維繫和部屬的關係。軍閥部隊的士兵則多從貧困的農民中招募而來。

軍閥的部隊既然是個獨立的基本組合單位，因此控制地盤的安全基礎以及稅收、物資和人力是必要的。地盤的控制更可取得合法性及參政頭銜，擔負起政府的職責。雖然軍閥政府在性質與效率各有不同的作風，但仍反映出政府軍人化的情形。政權的經費，靠稅收或專賣，甚至有時會壟斷或壓榨商人、橫徵暴斂。

軍閥的派系是在利益共識的基礎上聚合的，私人關係與交情紐帶在此發揮作用，親疏程度可以反映軍閥間的整合情形。軍閥發生戰事，可能為控制行政區或為地方性、區域性的經濟網絡而引起，不過正式的戰事仍以爭奪北京政權為重心。軍閥們相信中國終為一統，但他們是以擴展個人權力為軸心而發展，因此薛立敦指出，此時期的高度動盪，在於派系目標的暫時性與短期性¹⁰。軍閥混戰削弱了北京政權力量，也使面對外部侵略時變得脆弱。總而言之，軍閥為中國帶來恐懼與剝削。雖然軍閥行為助長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強烈尚武傾向，但未能形成國家的政治權力，其軍事化傾向也終究不是根本性和永久性的，中國文官統一體仍保存著。薛立敦指出，由於軍閥沒控制住知識界，因此促成1921年共產黨的建立及1924年國民黨的組成，此乃在相當程度上歸因於精神上的成熟。所以軍閥時期一方面標誌了中國政治統一與民族實力的最低值，另一方面也表現出思想與文學的巔峰。

第七章 思想的轉變：從改良運動到五四運動，1895-1920

1898年的改良運動及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思想史上與儒家文化價值觀決裂的兩個分水嶺。前者表現出放棄華夏中心觀，大規模接受西方新學；

後者的目標是創建科學與民主的新文化，與傳統決裂。此時期的知識精英有結構上的變化：聯繫的新方式有報紙刊物、研究會、黨派；知識活動漸職業化、專業化；知識階層也日益遠離政治權力的主流；在教育上仿效外國模式，並改造語言，俾能與人民大眾有溝通的橋樑。

傅樂詩是以中國人「發現西方」為背景來研究 1890 年後的思想轉變，因為 1895 年到 1898 年間，有改良派學會傳播肯定西方文明的著作¹¹。如王韜、鄭觀應、薛福成、郭嵩燾等人在早先的推動；其並逐漸發展出進化宇宙觀，作為「回應西方」思想的契合，代表人物有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四人。大體說來，改良主義思想家的進化宇宙觀，從強調宇宙力量到肯定以人為中心的力量對世界的影響；強調現代國家是進化過程中的積極因素，從儒道形而上學的進化模式，轉向富有自然主義色彩、歷史化傾向和世俗意味的進化模式。

值得注意者，中國改良主義以進化宇宙論作為宣揚西方文明的基礎，改良主義者卻對西方了解甚為有限，並且受到傳統基本價值體系的影響。如西方的憲法、議會制是為了制衡君主專制，但改良派則從試圖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達形式上的平等出發，將之視為可將二者團結一致的共同體。這種思想更展現了文化民族主義，不僅結合了中國固有的大同觀，並且運用孔子、孟子、老子等先賢的部分想法理念，作為落實理想的支持力量。

改良主義除了遭到主張革命的同盟會攻擊外，也要面對保存國粹者的挑戰，因而改良主義逐步萎縮，其後新傳統主義出現，主要是國粹派、國性派、孔教派各自提出使儒家傳統和等級制度適應現代條件的策略。傅樂詩認為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新傳統主義的發展是儒家哲學逐漸西化的過程，其在文化上與西方的抗衡態度，避免把中國價值世俗化，充分表現出復興的力量。新傳統主義對改良主義反動的同時，革命運動也在推行中，並且加入對抗改良主義的陣營上，牽引出激進派的思想理念：如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及社會主義的宣揚。1915 年創刊的《新青年》正式揭開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序幕，並且企圖調合之前的各家主義，然而到了後期，陳獨秀、李大釗將其改為共產主義運動的宣傳工具。

第八章 五四及五四之後的思想史主題

五月四日的學生運動事件，引發了政治、思想、社會的重大變故，反映中國青年民族主義的政治熱情，更觸動了對民生的重視，因而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入。其在日後不斷興盛，取得中國思想界統治地位。

五四時期顯現出各學說的衝突，如胡適與李大釗「問題與主義」之論辯¹²。五四時期全盤的否定傳統，促使新傳統主義更執著於從傳統中尋找真理。例如梁啟超，他將中國思想的核心歸溯於宋明儒學；其他新傳統，又如梁漱溟，他在佛教與王陽明學派中找尋慰藉，從實踐面強化張君勱「科學與人生論戰」中的某些觀點，可見傳統思想的諸種類型仍然遍布，且對知識份子發生影響¹³。

探討五四對未來的影響，不可避免要論及馬克思主義的興盛。由於革命以後，知識份子對於無政府主義的接受，以及自由主義的傾向，均使馬克思有其發展的空間，也因此促成日後中國歷史的變化發展。

第九章 文學潮流：追求現代性，1895-1927

中國現代文學的特點，乃是從道德角度把中國看成一個精神上患病的民族，因而造成了傳統與現代性的對立性；中國現代文學有反傳統的立場，此乃出於對中國社會政治的考量；雖反映對社會政治的強烈痛苦感受，惟這種批判觀念實具有濃厚的主觀性¹⁴。其起源則可以追溯到清末。文學報刊的出版，新小說理論與實踐，希冀對社會、政治的改革，發揮影響或是藉由諷刺的批評觀念來倡導改革。1912年徐枕亞《玉梨魂》開創鴛鴦蝴蝶派小說的流行風潮，似乎清末改良派的衝擊和小說嚴肅的內容，也隨王朝的崩潰而逐漸消失。與鴛鴦蝴蝶派可匹敵的是「南社」，它仍保有古典的文風。

1917年2月文學革命正式發動前，思想革命已逐漸在成熟中，如陳獨秀的《新青年》，及胡適的提倡新文學。新作家的崛起與新社團、刊物的興盛，呼應著五四所激發的熱情奔放情緒。此外，五四也帶來浪漫主義、個人解放，以及展現出強烈的主觀性，其中並有外國文學的影響。李歐梵曾以魯迅為代表，說明五四時期以來作家追求現代性的一個例子。

大體而言，五四時期的現代主義，反映了中國現代作家不是轉向藝術，而

是淋漓盡致地展現他的個性，並把這種個性色彩嵌在外部現實上面，因而中國文學中那種對現代性的追求，遂產生了一種悲劇意味。不過，現代性也未能真正勝利過，在中日戰爭爆發以後，這種現代追求中的藝術性方面，更是被政治的緊迫需要所排擠，創造性文學的價值降到了政治的附屬地位。從共產黨崛起的過程來看，可知儘管文學常有社會政治層面，現在性也不是其文學的中心特點。

第十章 1927年以前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

在持續不斷的道德墮落、政治動亂與經濟衰敗的情況下，中國試圖復興，卻不斷受外力侵犯。從世界範圍來看，歐戰暴露出西方文明的固有弱點，而布爾什維克 (Bolsheviks) 的勝利及隨後聲明廢止帝俄時代在中國特權一事，卻給中國的解救，指出一條嶄新的道路。在五四時期思想混亂的局面中，出現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如北京的《新青年》，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著作的日文譯本；與法國馬克思主義者接觸，強調反現狀的實踐、重視農工勞苦大眾、提倡革命的主張，均吸引著人們的參與。尤其以北京大學為中心，陳獨秀和李大釗等領導人物，更為之宣傳並提出理論支持。

布爾什維克的意識型態在推動全世界的革命事業。若中國能根據蘇聯的共產主義原則，建立一個新國家，則是符合蘇聯的目的。共產國際派將魏金斯基 (Voitinsky) 和馬林 (Maring) 到中國來，協助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的共黨加入統一戰線中，但參與的成果不能與國民黨相匹敵。1927年，蔣介石開始對南京、上海共產黨員採取血腥鎮壓，使中共更體驗到擁有自己的軍隊、領土和政府之重要性，所以陳志讓稱中共需要努力創造一個「國中之國」¹⁵。

第十一章 國民革命：從廣州到南京，1923-1928

20年代的中國，動員了龐大的人力及物力資源，完成國民革命的目標。這一場統一中國，廢除外國特權、革除社會不平等的革命運動，其中並有蘇聯的指導與援助。北伐結合軍事力量，然激進與保守民族主義者之間的內戰亦未嘗停止。孫逸仙是民族革命的首要倡導者，在廣州時常面臨困境，如1923年返回廣州後，由於缺乏實力未能穩固控制南方，財政收入亦非常有限，所以孫

逸仙開始考慮使國民黨恢復生機，並且接受蘇聯的協助，開始進行國民黨的改組計劃，並創造了革命的軍事力量。但革命陣營內部也漸漸出現衝突，孫逸仙死後，中國發生五卅慘案、沙基事件，大量激起民族主義運動，分裂了革命運動的領導。國民黨內有兩種分化，而共產黨亦滲透到國民革命軍之中，進行組織與宣傳的工作，奠定其廣泛的基礎¹⁶。蔣介石為統一中國，開始北伐，爭取到民衆的參與，激發反帝運動，並且收復部分外國特權，但革命陣營內部分裂加劇，發生左右派之爭，以及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決裂。

1928年國民黨推翻了軍閥所控制的北京政府，代之以由受過良好教育和具有愛國熱忱的人組成的新政府。但中國共產黨不再是國民黨的夥伴，它反對國民黨，並準備社會主義的革命。此外，北伐後雖然中國統一，但地力勢力的割據依舊存在，並且過去遺留下來的棘手問題，如混亂的幣制、導致貧窮和腐敗的納稅制度、及不完整的交通系統、農工問題以及有待普及的教育和公共衛生，凡此都對新政府構成了挑戰。

第十二章 中國的資產階級，1911-1937

白吉爾說明此時間的資產階級，主要從其誕生、辛亥革命中無形的資產階級革命，中國資本主義黃金時代(1917-1923)，到資產階級的政治失敗並走向衰落來探討。

中國資產階級的誕生，可追溯自19世紀末以來的經濟劇變，尤其是西方的介入帶來技術革新和管理方式，使中國的新型城市產生了資產階級。此外，中國傳統的紳士結合了商人，適逢國家政權和官僚的控制力減弱，讓商人團體有發展的空間，在租界及條約口岸保障商人的財產及人身安全，亦促成資產階級的形成。

白吉爾認為1911年的辛亥革命，資產階級只扮演一個次要的角色¹⁷。革命成功後，雖確立了發展商業的趨向，但資產階級並未獲得實權，官僚體制仍是地方勢力重心。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促成中國資本主義的活躍。因為民族工業興起，原料需求增長，加上銀幣升值的優勢，讓中國經濟增長進步。都市的迅速發展，使近代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從傳統紳商中崛起，形成城市精英，一方面穩定了社會，一方面也發展了革新和主動的精神。

資產階級參與政治，並希冀經濟發展結合民族主義、工業增長及社會和諧，所以參與非常熱切，並且籌劃抵制外貸的群眾運動，以促成資產階級的經濟發展。但資產階級終究缺乏政治成熟，又缺乏堅持的恆心，加上自由主義未能傳播到大部分的內陸區，使資產階級只能維持短暫的黃金時期。1923-1927年，面對帝國主義的捲土重來，民族主義產生危機，而國民黨發起的統一戰線政策與資產階級未能產生共識且有衝突，加上資產階級內部分裂的表面化，在孫逸仙死後，資產階級與革命黨的裂隙更加擴大。

白吉爾認為1927至1937年資產階級地位走向衰落，並被官僚政治所取代控制。南京政府採取分化和互相牽制的方法使資產階級的政治和社會活動力縮減；銀行家與政府採合作態度，但工商業者不被拉攏且課稅重。大體說來，此時期資產階級被整合到國家的機構之中，強制的手段對企業家打擊最大，特權則讓銀行家受惠最多。由南京政府建立一種以官僚的專業化為基礎的新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出官僚與資產階級的共生關係。不過，白吉爾不認為官僚化是牽制現代經濟的最終因素，應該說是中國本身的國家因素太弱了，導致資產階級力量不足。雖是如此，資產階級所遺留下來的特性：都市性、現代性、民主性、世界性，仍繼續激勵中國未來的現代發展¹⁸。

三、結 論

雖然歷史的真象只有一個，但歷史研究者的背景、論述的筆法以及著重點的不同，往往產生的歷史解釋，因此，我們面對歷史，除了以客觀的方式來理解認知之外，更重要還是要廣泛閱讀，方能更趨近於歷史的真相。

以五四運動思想史的主題來說，史華慈除了分析出其有進步、民族主義、革命、新文化的內涵外，也論述五四的影響：包括了馬克思主義的引入宣揚、大眾文化的重視，「新傳統主義」的出現等。其在看待五四運動時，並未以西化為主軸，而是從中國本身所發展的文化思想切入，同時也注意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反撲。如前所述，本書係劃分主題章節，由專長的學者分別論述，其中除了歷史學教授之外，亦有政治學、文化學、文學各科教授參與，透過分工的合作，組織成完整的歷史回顧，就此而言也可說是一種科際整合的努力，它

提供讀者從不同角度來思考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情形。

歷史是一門繁富的學科，所以在分析問題時，從不同角度來看，才能趨向客觀、理性，並且獲得完整、圓融的答案。以研究者立場來說，不同的背景，其所強調的部分亦有所差異。費正清在第一章導論，便以中國沿海、通商口岸為切入點，討論外國勢力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其以外國人的身份分析這個問題，難免對外國人的影響力特為突顯。這種從不同立場來進行論述，自然也提供了讀者其他思考的面向，自然也拓展了我們的本國歷史視野。

國外學者對於近現代中國的研究，在探討歷史傳統與社會現代化間的關係上，有不同的基調論點。50-60年代，西方研究中國大多傾向於把中國的傳統社會視為一個少變、穩定平衡的社會，而對於現代化的挑戰，傳統社會自身無法產生變革之能力建立現代社會¹⁹。70年代時，則重新檢討傳統和現代的關係，認為兩者非絕對的對立與衝突，傳統因素和現代因素之間存在複雜的關係，有相融合的可能，且傳統中有朝向現代化的潛在存在²⁰。並且到了80年代，西方學者開始把現代化理論系統地應用到中國問題研究上，有總結意義的嶄新成果，亦即「找出中國社會中有助於或已經有助於現代化的因素和阻礙現代化的因素」。

80年代出版的《劍橋中華民國史》，從不同面向思考了中國由傳統朝向現代化變遷的過程。就整體而言，此書大體延續了各個作者的早期著作，除對外來因素與中國現代化關係作進一步的剖析外，並且說明了傳統力量是對此一過程的制約、調適作用。基本上仍不脫60年代「挑戰—反應」說的論述格局，特別強調外來因素的重要性以及傳統文化對中國現代化的限制。其雖提供歷史讀者不少的思考空間，唯在近年以來，有關中國現代化的研究，已日益精進。事實上在90年代的今天，大部分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變遷的學者，均已能接受內、外因皆不能偏廢的觀點。這是吾人閱讀此書不可不特別注意者。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三年級學生）

註 釋

- 1 費正清主編、章建剛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頁2-10。
- 2 前引書，23。
- 3 前引書，頁39-41。
- 4 巫寶三(Wu Pao-san)《中國的資本形成和消費者的支出》(Capital formation and consumer outlay in China') (哈佛大學，1948年)，頁204-211；劉大中(Liu Ta-chung)和葉孔嘉(Yeh Kung-chia)《中國大陸的經濟：國民收入與經濟發展1933-1949》(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nation inco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33-1949) (普林斯頓大學，1965) 66 43-47。
- 5 《劍橋中華民國史》，頁176-180。有關基督教各大傳教團體，見同書，頁182，表33。
- 6 前引書，頁241-269。
- 7 比林斯利(Philip Richard Billingsley)《中國的盜匪活動：關於河南省的情況，1911-1928》(Banditry in China, 1911 to 1928,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Henan Province') (利茲大學，1974年)。《劍橋中華民國史》，頁254-255。
- 8 《劍橋中華民國史》，頁283-285。
- 9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北京政治，1918-1923：派別活動與憲政的失敗》(Perking politics' 1918-1923: 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加州大學，1976年)，頁106-110。《劍橋中華民國史》，頁289-293。
- 10 《劍橋中華民國史》，頁312-320。
- 11 前引書，頁341-359。
- 12 前引書，頁461-463。
- 13 前引書，頁468-474。
- 14 前引書，頁481-483。
- 15 前引書，頁570。
- 16 前引書，頁603-606。
- 17 前引書，頁780-788。
- 18 前引書，頁878。
- 19 如李文孫(Joseph R. Levenson)《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柏克萊大學，1968年)。

- 20 如柏金斯(Dwight Perkins)《中國現代經濟的歷史考察》(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史丹佛大學, 1975年)。
- 21 羅茲曼(Gilbert Rozman)主編《中國的現代化》(紐約, 1981)。